

跨越五千年的追问 文/张槿

——如何发现不发光的金子？

是金子，埋在哪里也会发光！

——尼采

尼采的这句名言在物理学上站不住脚，已是无需更多例证的事实。而对与其更具针对性的人才评价与选拔机制而言，这样的论断恐怕也同样有过分阿Q之嫌——自古以来，又有哪一种人才甄选方式是百试百灵，让所有人感觉公平信服的呢？

那些星罗棋布在各朝各代，终其一生都在努力上进却被历史遗忘的怀才不遇者们，若是听闻这位德国哲人的论调，不知作何感想？我们虽然未必关心，但谁都无法否认这样的事实：长眠于地下的许多人，也许一生悲叹不遇伯乐，也许最终难免蝇营狗苟，也许始终浑浑噩噩，可他们有成为金子的可能与潜质；如若换一个时代与社会，换一个家庭与环境，换一个贵人与朋友，甚至在风云际会中换一只蝴蝶的无意振翅，他们就可能迎来不同的人生。

我相信，这样的人，多如恒河沙数。

他们湮没在人潮中，大约是教育最大的悲哀。



对于如何鉴别金子，人们花的力气实在不小。**最典型的莫如尧。**

尧在位70年，感觉治理国家已然力不从心，自己的儿子也不太争气，于是开始寻访继任者。四方的诸侯推荐了舜，尧便对这个年轻人进行了严格的考察。考察的代价是今天难以想象的：尧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与女英都嫁给了舜，以便获取更全面、真实的信息。考察的周期也是长久的，整整花了三年的时间，舜在各个任务中的表现均十分出色，让尧放了心。

尧选舜，是一场特殊的“等额选举”，选举决定权在尧一人之手，候选人也只有舜一个。在这样一场考察中，尧尚且如此大费周章，实在堪称尽心尽力，也不难理解——毕竟涉及政权的交替。这样慎重的进行评价，其实在历史与各类传说中并不少见。比如在《天龙八部》中，身为契丹遗孤的乔峰在接任丐帮帮主前，经受了“三大难题”，立下了“七大功劳”，才打消了汪剑通的顾虑，让他继任帮主之位。这样的故事，具有传奇性，能够突出主角的强大，读者喜闻乐见。不难看出，这样“日久见人心”、反复捶打的考察方式很有民众基础。

而更多时候，选拔是一种“差额选举”，到底选择谁，是一个复杂的抉择过程。比如如今市井妇孺也耳熟能详的“九子夺嫡”。康熙作为成就闪耀中华历史的“千古一帝”，其皇子阵容的实力也数一数二，二十五人中有九人能力出众。但人才鼎盛也绝非皇家之福，康熙崩逝前悬于匾额后的传位遗诏也终于成为了满清四大疑案之一，“九子夺嫡”也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帝王家的悲剧。

无论是尧舜的禅让，康熙的传位，还是乔峰的继任，所有选拔者的态度都是无比真诚的——希望能够找到最合适的人才。这样的评价，无疑是最古老，却恰恰又是最符合评价本质的：

首先，考察的周期是十分漫长的，通常要经历数年数十年，这大大杜绝了一次性评价的偶然性，人的本性也更容易在经年累月的接触中得以暴露。其次，评价的内容是具有现实意义的，而不是一些抽象的纸上题目。当然，评价的决策者可能并没有一个严格的打分表，更没有模型，也不见得知道自己如何通过任务去进行评价，但是他们希望通过真实的情境来考察继任者们的水平，这点取向是不可动摇的。受考察者在现实生活中的品行，应对问题，处理政务，军事攻伐，统领沟通等能力，都会纳入考虑范围。最后，选择结果的依据是综合考量后的产物，绝非一些学科、一些能力的简单累加。

在特定的情况背景下，有些因素的重要性会被放大，比如曹操在选择曹丕还是曹植时，就受到了袁绍“废长立幼”悲惨结局的影响，“长子”变成了决定因素。

但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过程中，这样费时费神伤感情的评价方式并不多见。对于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度来说，大多数时候容不得我们对一个岗位的人进行反复斟酌地精挑细选；而更需要的是能够胜任大浪淘沙的筛子与漏斗。

所以，面向普通人的选拔，更多拼的是概率。

怎样的人可以成为人才，一直是困扰着古人的问题。

先秦时代，“世官制”是重要的选人标准，家庭出身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有没有机会做官。其实，这种情况无论古今中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都或多或少存在。即使到了现代西方，看似自由的环境，实际上社会阶层的固化仍然是难以消解的难题。在BBC推出的纪录片《七年》中，我们就能跟随一群英国公民，见证他们从7岁儿童成长为56岁中老年人过程，不难看到阶层分化在他们身上留下的烙印。

但就是在这样的世官背景下，也并非没有普通人逆袭的戏码。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我们都曾背过“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这样的句子。这些身世飘零的“金子”都把握住了人生的机会，离开了泥土，立下一番功业。

但是，这样的选拔制度显然无法满足雄图大略的帝王之心。思路清晰的领袖其实早就发现，人的才能和出身并没有必然的关联。因此到了汉代，察举制应运而生。地方长官可以向朝廷推荐人才，经过朝廷考核予以录用。在那个年代，许多出生贫寒的人：主父偃、东方朔、司马相如等都借此际遇登上了人生的高峰，站到了历史的聚光灯下。

然而，任何以人性为基石的制度都经不起人性的考验。察举制毕竟需要依靠有权势者的推荐，而这种推荐带来的利益又如此显著。在东汉年间，其以权谋私的弊端就显露无疑。所以，一代枭雄曹操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策略，而且他本人也身体力行，成为了重视贤才的表率。而与其同时代的刘备、孙权等，身逢乱世，更深切感受到人才对于战局的决定性影响，所以孕育了“三顾茅庐”、“吴下阿蒙”等典故——故事虽未必真实，但背后透露的人才饥渴情绪却很具有代表性。也难怪在濡须口，曹操会发出“生子当如孙仲谋”的旷世感叹——这放在其他时代都是难以想象的。所以说，三国时代当真是草莽英雄脱颖而出、建功立业的黄金时代。

不过这种盛况在魏晋时代就急转直下，曹丕为了巩固政权，必须兼顾世家大族的利益，因此在陈群的建议下，推出了九品中正制，走上了人才甄选的中庸路线。其看似有理的家世、品行、才能三者并重的选拔标准，最终演变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社会悲剧。究其原因，在“家世”“品行”“才能”三者中，毕竟只有“家世”才是无可争议的客观指标，而“品行”“才能”的考评或多或少都面临非议和风险。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魏晋人物中，给后人留下较深印象的只有“风流倜傥”的乌衣子弟，而说到晋人之风，也难撇去一身颓唐之气。竹林七贤若是放到高歌猛进的时代，难免有种“扶不上墙”的感觉。“清谈”而不务实是当时世人的行为风格；“醉生梦死”则成为了这一个时代的标签。

直到隋代，大一统的科举时代到来。



我们很难否定“科举”对于人类社会的深远影响，即使是许多西方教材中也不会回避这一点——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对于当今全球考试体系的先驱意义。至少在技术上，科举探索了一种面向全国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生源的选拔方法，它产生的动因是进步的，充满了情怀，它试图给予寒门弟子一个上升通道。

在科举悠久的历史中，取得状元，或哪怕只是进士及第，那都是光宗耀祖的大事件。即使像《红楼梦》中贾家拥有世袭爵位的大户人家，仍然会以考上功名作为荣耀。在这样的社会风潮下，“考试”真正开始关注人的才能，“才能”和社会地位紧密地挂起了钩。我们也得以认识了许多古代才子，比如主持编纂《永乐大典》与《四库全书》的解缙与纪晓岚，还有为人津津乐道的唐伯虎等江南四大才子。

虽然都是名动天下的才子，但解缙、纪晓岚、唐伯虎三人在科举中划出了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这似乎也在昭示着，科举的成绩，从来与人的才能并无太大关系。关于这一点，常年落魄在书斋中充满幻想的蒲松龄老爷子应该更能深刻体会。

科举作为一种社会举措，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每个人都有了进步的可能性——尽管他们在受教育机会上本来就不平等。但在封建社会，这样的上升通道自然是难能可贵的。这种积极意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掩盖了科举带来的消极的技术性影响：考试的内容，考试的形式，都指向考生的单一能力。八股文出色的，善于掉书袋的文人们在这样的考试制度下得以晋升；而实际的治国经邦能力，却远非华丽文字所能取代。

纸上谈兵的危害性，早在战国时代，赵奢就曾警告过。他儿子的满篇宏论能够把赵王看得心花怒放，但却瞒不过对他知根知底的老父。所以，单凭纸笔测试大放异彩的人才，大概也称得上一句“纸上得来终觉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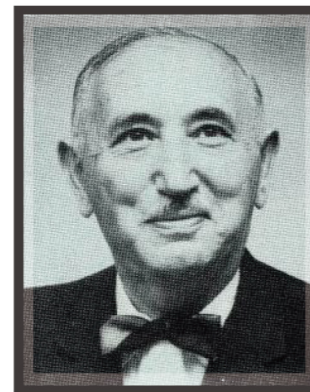
可是，人们还有更好的方法吗？清末时期，科举改革走出了艰难的一步，八股被改为了策论。这一点很少被人强调，因为实在属于换汤不换药的微创新，无法对人才甄别提供更有力的支撑，而且在大清覆灭的历史幕布下，从未来得及绽放任何光辉。

当中国的封建王朝退出历史长河之时，欧洲也正在日新月异的发展。二十世纪初，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教育不再是少数贵族的权利，开始成为了需要普及的社会公共服务，成为了政府的一种职能，不再是家族徽章下的特殊福利。但这种变革也有许多适应不良的地方，比如，法国政府就发现，许多孩子根本就跟不上义务教育的进度，明显比其他孩子要慢一拍。如果这些孩子留在教室里，会影响其他学生的学习。

所以在1905年，法国政府邀请了心理学家来开发一种工具，用来甄别无法正常学习的孩子。由此，世界上第一套智力量表“比奈-西蒙”量表横空出世，把许多头脑不怎么灵光的孩子排除在了义务教育的门外。

今天看来，比奈-西蒙量表的应用无疑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因为它挑战了“考试”的常规。首先是考试的目的——过去的考试是为了选拔出类拔萃的人才，而量表的应用则是设定了接受教育的下限。它的划时代意义还体现在测试的指向——考试重视的是知识，量表考察的是心理能力。

从此之后，知识测验与心理测验分道扬镳，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而他们所代表的选人价值观以及方法论也随着时代与社会审美的变化不断在摇摆。



A.比奈

法国实验心理学家，智力测验的创始人。1905年他与T.西蒙一同创造了测量智力的方法，编成了《比奈-西蒙量表》。

回到中国，高考成为了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大考试，并且在近年来也早已荣升为世界第一大规模的考试。它在意义上并非科举的传承——高考选择的是有潜力进入高等教育接受深造的生源，而不是科举那般甄选能够踏上仕途的人员。但不幸的是，高考却在方法论上极大地承袭了科举——一考定终生，而且出现在考卷上的内容，与人才的未来发展，在解决实际问题时能够体现出的能力，实在很难挂起钩来。过去的四书五经八股文是如此，今天的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历史、政治，同样如此。

考试中优秀的，在现实中未必优秀。为什么这些学科取得更高分数的就能进入更好的学校，而不是其他几门学科？这是一个谁都无法完美回答的问题。

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方法来评价一个人？当我们面对这个问题时，突然发现，其实我们并没有比五千年前多走出几步。我们对目标的理解依然很模糊，我们手头的方法仍然很有限，而我们面临的社会要求则更为复杂。

我们的考试方法，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学业考试还是心理测试？

不难发现，这两种测试有着非常不同的价值取向：前者看中学生的后天努力——对知识的学习掌握情况，是可以通过个人奋斗而获得的；后者看中中学生相对与生俱来的天赋——这些能力与遗传、家庭背景、学生本人的神经特质等有较大的关联，相对比较稳定。

所以，他们的应用也能看到非常清晰的分水岭：如果从社会公平的角度出发进行考虑，那么教育者更应该肯定学生的学业成就，因为这是他们主观努力的成果，社会应当认可这种努力的价值。但是对具有特殊培养要求的机构或学校来说，天赋可能是更重要的因素，因为特定难度的学习与训练，必须建立在一定的天赋水平之上才能得以实现，而选择具备这些天赋的苗子，培养将可以事半功倍。

在专业领域，这两种价值取向截然不同的评估都属于“教育与心理评估”的范畴。但由于社会价值观以及对教育诉求的影响，长期以来学科水平的评估一直处在更显性的位置；而心理能力的评估则显得可有可无，甚至受到批判。

但近年来，由于学生学业负担变得过重，甚至已经到了违背学生本身的心理发展规律的地步，因此社会对于教育评估的压倒性应用开始了反思。当我们只关注知识的积累时，就会忘了人本身的极限，把每一个不同能力的个体都投入统一的学科标尺下去进行考量，这本身就是与现代教育理念背道而驰的可怕事件。

于是，历史的钟摆又一次摆过了原点。人们重新认识到，学生对于知识吸收，除了与其学习的努力程度有关以外，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他的心理能力。只有正视学生本来的能力水平，才可能实现因材施教。

所以，对于学生心理能力的评估，又一次站到了历史的台前。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世界上已经出现了数百种针对学生基础素养以及心理能力的测量产品，它们关注的维度不尽相同。如果总结起来，其中科学家最为关心的大致有以下几种：逻辑思维，空间几何，注意力，记忆力，语义理解，精细动作，情绪理解等。当然，这些范式无法覆盖学生所有的心理能力，而且，不同范式对学生能力的解释作用也有强有弱。但是，经过长期研究的范式，一般是能够较好地预测学生的学习成就的。

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寻找“金子”，也比单纯检测学生现有的学业水平来得更为牢靠。因为学生在当下学段所具有的学业水平，未必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潜力，他有可能只是通过努力背诵记忆或者反复练习习题后形成了条件反射，但对于更高难度的任务缺乏足够的理解能力。而在评估了学生的心理能力之后，教育者至少能肯定他具有足够的多元智力基础来胜任更高难度的学习挑战。

当然，在范式的呈现上，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也给予了评估者更多的选择。除了传统的纸笔与道具之外，利用电脑和移动终端进行测试已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因为人机对话拥有诸多优点：题目的呈现能够精确符合范式要求，没有主试效应，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不会干扰学生答题，计分客观迅速，而且还能收集答题时长，答案修改等传统测试中无法收集的数据，对于更准确把握学生的能力状态提供了更丰富的信息。

有了高科技的支持，我们似乎也有理由相信，我们离发掘“金子”更近了一步。



扫描左侧二维码，让我们一起开始新技术支持下的招生选拔。